从合作馆藏到集体馆藏的探索:法明顿计划 80 年后的审思*

■ 张康 李卓卓 苗淼儿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苏州 215123

摘 要:[目的/意义] 回顾法明顿计划后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探索历程,分析合作馆藏、集体馆藏的深层价值意义,为新时期我国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研究和实践确定锚点。[方法/过程] 回顾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进程中的两次"里程碑"——合作馆藏、集体馆藏,揭示其背后的价值意义,并分析这些价值意义如何推动合作馆藏转向集体馆藏。[结果/结论] 研究发现,法明顿计划从目标指向、内涵设置及实现途径 3 个方面为早期合作馆藏发展奠定了基础;20 世纪 70 年代和 90 年代,对合作馆藏的探索先后经历了对"高度利它性"和"协作式合作馆藏"的反思,完成了"尊重成员利益"和"互补式合作馆藏"的转向,并于 21 世纪初在数据驱动、凸显合作效益的意义设计中重构,转向系统意识下的集体馆藏。这些价值意义对我国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实践具有启迪作用:强化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追求越精准越协同的共赢理念,凸显数据赋能的效能导向。

关键词:法明顿计划 合作馆藏 集体馆藏 信息资源共享 信息资源建设
分类号:G250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1.20.004

1 引言

回顾整个近代信息资源建设的发展历程,图书馆的发展和信息资源变革如同驱动信息资源建设的双轮,同样,信息资源建设也对图书馆发展至关重要[1]。无论是信息资源共享理论,还是实践,其基本前提之一是——任何图书馆都不能独自建立起满足所有用户所有信息需求的馆藏资源,合作是图书馆发展的必由之路[2]。1942 年,美国于法明顿举行会议,推动法明顿计划(Farmington Plan)的实行,迄今已近 80 年。法明顿计划以外文科学研究资料的共建共享的探索成功孕育出合作馆藏(collaborative collection),因而在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20 世纪中后期,在馆藏建设"大而全"观念的导向下,法明顿计划孕育出的合作馆藏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成为在促进图书馆保障人类信息资源有效查询和获取方面的优势创新形式。20 世纪末,在经历了图书馆使命重构、角色选择、功能设计、社会价值等一系列反思调整之后,合作馆藏主流发展模式由"协调式(synergism)"转向"互补式(complementarity)",并在 21 世纪由合作馆藏走向"集体馆藏(collective collection)"时代。

从法明顿计划孕育出合作馆藏的萌芽,到合作馆藏优势地位和协调式模式的确立,再到集体馆藏对补充式合作馆藏的再定义。在过去的 80 年里,环境的变易、图书馆对自身影响力的反思都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图书馆在信息资源建设方面的调整。合作馆藏自诞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显示了其在促进用户取用资源的有效畅通、扩大馆藏效益、节约图书馆资源共享成本方面的可能回报。21 世纪以来,虽然合作馆藏的形式内容和价值理念也已发生了改变,完成了从"高度利他性"到"尊重成员利益"、从"协调式合作馆藏"到"互补式合作馆藏"的转向,其实践意义得到进一步延续,但是,现代图书馆学已经确立了"馆藏不再是用户

* 本文系 2019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多源数据的区域文献联合处置研究"(项目编号:19YJC870013)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张康(ORCID:0002-0002-0461-1218),硕士研究生;李卓卓(ORCID:0000-0002-3022-5652),副教授,博士,通讯作者,E-mail:smileforver96@126.com;苗淼儿(ORCID:0000-0002-4322-4237),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21-04-08 修回日期:2021-06-10 本文起止页码:31-41 本文责任编辑:王传清

信息生活的核心,图书馆的目标不仅是建立一个大型的馆藏资源集合”[3]的理念,集体馆藏也由此应运而生。集体馆藏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机构的馆藏,通过将馆藏合并去重,形成一个来自一组图书馆的独特资源集合。作为一种超机构、超规模的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形式,集体馆藏将图书馆信息资源从本地提升至全系统,为信息资源共享创建了一个更为宏大的全系统意识,不仅巩固了图书馆馆藏的固有优势,释放空间和消除冗余,而且促进了图书馆从合作走向跨域深度协同,一度被认为是信息资源共享的未来方向[4]。

从合作馆藏到集体馆藏,图书馆不断探索新的信息资源建设理念与实践,期望在新的浪潮下保持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社会支撑,参与到社会发展进程中。自法明顿计划起,在长达近 80 年的信息资源共享实践中:①信息资源共享理念与实践经历了哪些明显变化?②推动欧美等国家从合作馆藏转向集体馆藏的诱因和内在动力有哪些?合作馆藏与集体馆藏是否等同,两者具有何种关系?③合作馆藏和集体馆藏能够为我国信息资源共享提供何种借鉴?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以法明顿计划为切入点,审思合作馆藏转向集体馆藏背后的信息资源建设内涵演变,在此基础上揭示其背后的价值意义,并揭示这些价值意义如何推动从合作馆藏转向集体馆藏,以期为我国信息资源共享提供有益洞见。

2 研究综述

自法明顿计划孕育出合作馆藏起,几乎每个时期的专业文献都记录了图书馆学界和业界为信息资源建设所做出的努力,为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2.1 法明顿计划的研究

法明顿计划之所以在图书馆学情报学、出版学界被广泛提及,主要是因为其在信息资源共享方面的贡献。早期研究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结论。1959 年,V. Robert 通过对美国外文图书和保障程度的调查指出,该计划是美国图书馆历史上图书馆合作最重要、最开明、最有成功希望的实践之一[5]。此外,美国国会图书馆在该计划运行期间进行的每十年一次有关该计划目的、范围、结果的调查与反思[6],以及王劲松等[7]对该计划的历史回顾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但伴随该计划的破产,也出现了一些质疑,如 H. Edelman 在通过对该计划的参与者的调查指出,法明顿计划使得大量使用价值低的外文图书资料涌入美国图书馆,缺乏必要的技术支持条件和资金运作条件,通过法明顿计划建立的外文文献保障体系很难发挥使用价值[8]。但 C. Y. Shelton 通过将法明顿计划孕育的合作馆藏实践与环太平洋图书馆数字联盟的成就进行比较,指出法明顿计划失败的主要原因为美国财政困难导致图书馆经费缩减,而并非意味着图书馆不能通过合作进行信息资源建设,反而图书馆应强化在信息资源建设方面的合作[9]。这些研究采用历史回顾、现状调查的方法,充分挖掘历史资料,为人们勾画出了法明顿计划的基本形象——由美国国家图书馆主导,以保障外文研究资料获取为目的的一次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实践。但相关研究少有对法明顿计划背后的深层价值进行探讨,也很少从整个信息资源共享历程去审视该计划,并未与随后的合作馆藏和集体馆藏建立联系。

2.2 合作馆藏的研究

自 20 世纪 40 年代起,合作馆藏的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取得丰富的成果,尤其是伴随美国、芬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合作馆藏项目的推进,研究成果得到进一步丰富。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合作馆藏项目考察、合作馆藏概念解析、合作馆藏运行机制等方面。如 J. Sohn 在回顾合作馆藏发展历史的基础上,结合美国北部合作馆藏案例实践,发现合作馆藏在节约图书馆的馆舍空间和运行管理成本、改善图书馆服务、提升用户满意度与社会信任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资金的支持、机制的完善是保障合作馆藏项目运行的重要基础[10];郭晓红先后对缅因州共享印本馆藏项目[11]、美国西部学术资源区域合作储存项目[12]的背景、概况、管理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介绍,指出组织制度保障、技术支持、成员协调与协议制定等是合作馆藏成功的基础。与此类似的还有 C. Y. Shelto、G. N. Dannelly 等的研究,C. Y. Shelto 通过对 18 个合作馆藏成功项目在印刷品选择、电子采集、资源访问存储和保存等方面的调查,指出合作馆藏项目的成功需要有效沟通和协商、明确目标和重点领域的确定以及相应的技术基础设施[9]。G. N. Dannelly 认为,由于图书馆在线公共访问目录和相应技术的变化,合作馆藏的未来努力在于构建紧密联系的图书馆联盟,具体应在提供更丰富的资源库、经济地使用资金和制定共同的行动纲领等方面着力[13];M. Mallery 通过对美国 84 个合作馆藏项目进行调查,发现合作馆藏已经成为信息资源共享的普遍尝试,高校图书馆参与程度远高于公共图书馆,其合作馆藏的对象逐步由印刷文献为主转向电子文献为主,协同电子采购催生了合作馆藏发展的热潮[14];S. Bosch 等以

美国西部图书馆联盟合作馆藏项目为考察对象，借助平衡计分卡，从资源数据、财务数据、使用数据和用户满意度 4 个方面进行调查，提出了合作馆藏成功与否的定量评价指标[15]。这些研究多以合作馆藏项目为依托，是对项目的背景、运行、成效等的介绍，推介性较强；将合作馆藏作为信息资源共享的手段进行考察，缺乏对合作馆藏背后蕴含意义的深层思考，也鲜有研究关注到合作馆藏在发展中有关“尊重成员利益”和“互补式合作馆”的理念与形式的转变，因而在理论层面的研究相对薄弱。这也是导致近年来合作馆藏遭遇发展瓶颈，被集体馆藏所替代的深层原因。

2.3 集体馆藏的研究

相较于合作馆藏的丰富成果，集体馆藏作为一个较新的概念较少被谈及。R. H. Kieft 在对美国印刷文献馆藏政策发展历史的梳理时指出，集体馆藏是比合作馆藏更为先进的信息资源共享战略，在日益丰富的数字馆藏、不断重组的知识生产和分配以及不断变化的技术和图书馆工作环境中更具适应性[16]。在此基础上，S. Dema 指出，合作馆藏强化了图书馆与用户、图书馆与图书馆的联系，但图书馆必须在地方、区域和国家优先事项的背景下重新考虑信息资源共享，并提出了一个服务于区域和国家战略的集体馆藏协作框架[17]。这与 G. Jeremy、L. Dempsey 等的观点类似，都试图将信息资源共享上升到全系统的战略高度，把集体馆藏作为未来信息资源共享的主流方向[18]。同时，伴随集体馆藏项目的成功与发展，部分研究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聚焦于具体集体馆藏项目。如 N. L. Helen 对密歇根州集体馆藏项目中用于分析集体馆藏共享机制和保留需求数据的 GreenGlass for Groups 工具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19]；T. Bakker 在回顾荷兰国家信息资源共享历史的基础上，指出传统的合作馆藏项目并没有为信息资源共享面临的困境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而在数字环境的过渡下诞生的集体馆藏却能为图书馆提供新的机会，并选取了 3 个集体馆藏项目作为案例，探讨了集体馆藏对合作馆藏的取代作用[20]；王红霞以十大学术联盟集体馆藏项目为研究对象，从战略、馆藏规模、主要项目和馆藏评估等方面对该项目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指出我国图书馆在推进集体馆藏建设过程中应当建立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重视战略规划和政策框架、逐步推进分型建设、重视馆藏发展评估[21]；许炜等从“双一流”背景应对学科细分、共享粒度和效益显性化的新要求出发，引入集体馆藏这一概念，提出了系统意识下数据驱动的集体馆藏与精准合作的高校信息资源共享思路[22]。与上述合作馆藏研究类似，集体馆藏的研究也具有明显的循证实践思想，这与图情档学科本身的社会科学属性和学科研究的问题导向有关。集体馆藏的相关研究与集体馆藏实践项目发展紧密结合，力图用以解决集体馆藏项目运行中的实际问题，具有明显的跟踪性和目的性，侧重于对集体馆藏的实施推进过程中的经验总结，但缺乏对集体馆藏背后蕴含信息资源建设理论的进一步阐释。

基于此，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采用历史回顾的方法，以法明顿计划为起点，审思法明顿计划孕育出合作馆藏后，合作馆藏转向集体馆藏背后有关信息资源共享理念与形式的深层意义，从整体而不局限于某一项目和某一概念的阐释与介绍，从历史发展中总结出推动信息资源共享发展演变的深层内涵，进而指出全球图书馆界集体馆藏战略下我国信息资源共享的发展方向，以便为全球视野下我国信息资源共享的研究和实践确定锚点。

3 法明顿计划的缘起及合作馆藏的萌芽

法明顿计划最早可以追溯到 1942 年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法明顿进行的专门会议，该会议直接推动了 1948 - 1972 年法明顿计划的形成[23]。该计划深受“战时出版物合作采集计划（联邦政府主导）”影响，旨在系统地收藏世界各国各类型文献，尽可能使美国任何一个研究人员感兴趣的外国出版物在美国至少有一个图书馆收藏一份，并尽快列入《全国联合目录》，便于用户通过馆际互借或照相复制而加以利用。这个计划产生的背景与二战后美国崛起和图书馆馆藏政策的调整密不可分。当时美国政府出于国际战略考虑，由联邦政府提供专项资金，在外国出版物采集委员会（法明顿计划委员会）的协调下，以部分研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为主体，通过集体合作采购外文图书，帮助图书馆摆脱经费不足困扰和提高自身竞争力，建立了美国外文研究资料的合作收藏体系。

从法明顿计划实施的背景和实际效用来看，法明顿计划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似乎一开始就期待它产生两种价值：使用价值和存在价值。所谓使用价值是指它要构建一个美国外文研究资料的共享保障体系，以满足美国学者对外文研究资料有效获取的需求，支持进一步的科学研究，这一价值目标与同时期布什在《诚若所思》（*As We May Think*）一文中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如何保障科技成果的有效存取利用与转化）近似[24]；

所谓存在价值是指合作馆藏作为一种创新，标志着一种共建共享的信息资源建设形式的诞生，告诉人们图书馆可以通过合作提高其竞争力，彰显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在开放、共享和合作的社会环境中的价值。为了实现这两种价值，该计划采取分阶段方式逐步扩展文献收藏范围，以求尽可能完整地收藏世界范围内的全部研究资料。1948年，该计划在实行之初收集了法国、瑞典和瑞士3个国家的出版物；1948－1951年按照学科分工，又收集了13个西欧国家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16个国家的出版物；1951年起实行一个图书馆收集一个国家所有近期出版物的策略，收集范围进一步扩大；1953年发展到收集79个国家的出版物，1961年又增加到收集123个国家、805类藏书的研究资料[25]。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该计划收集的三分之二的单本出版物是特有的独占性资源，即难以通过其他资料获取，而且该计划收集的12.5%出版物又是符合研究者使用需求的。

除此之外，为了保证这种使用价值的有效发挥，法明顿计划的主导者还要求参加计划的成员图书馆按照统一标准，对收藏文献进行系统组织，以保障共建馆藏资源的有效共享。为此，该计划通过完善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卡片联合目录，对入藏文献进行目录控制，统一发行书本式《全国联合目录》，在全部成员馆实行全开放的制度，试图通过书目情报控制，推动馆藏资源的共享[5]。尤其是伴随1965年MARC的开发和推广，从根本上改变了图书馆馆藏书目信息的组织和利用方式，形成了以书目共同体为基础的合作馆藏收藏体系。通过这一方式收藏的外文研究资料在1972年达到了顶峰，有11.5万余种[6]，有效满足了美国对国外文献的需求。

由此，美国形成了一个文献重复率低、学科类别覆盖全的外文文献保障体系，研究者可以通过馆际互借或复制来共享收藏的研究资料，这一创举被称为合作馆藏的第一次实践。虽然其主导力量是代表美国联邦政府的国会图书馆，但在信息资源共享进程中仍具有划时代意义。对法明顿计划的上述回顾显示，法明顿计划作为合作馆藏的滥觞，为合作馆藏留下了多种宝贵经验。

法明顿计划的第一个后续影响就是其目标和发展理念为合作馆藏目标的确定提供了参考。如上所述，支撑法明顿计划发展的理念有：①满足美国学者对外文研究资料的使用需求，尽可能全面收集世界各地研究资料，至少是重点学科和重要学者需求的文献；②通过对入藏文献的系统化组织加工，并通过成员之间相互依赖和协调的方式，实现研究资料的共享。这两大理念派生的基本问题是如何通过集体协作建立起一个“大而全”的馆藏资源共享体系以满足美国研究者对全世界研究资料的有效获取。因此，从性质上说，法明顿计划对合作馆藏的后续影响由目标构成，它为合作馆藏目标的确定提供了参考，即通过向读者提供本馆没有的资源实现优质服务，以相互依赖和协调的方式实现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重复藏书，并引导日后合作馆藏围绕这个目标发展自身。

法明顿计划的第二个后续影响就是确立了合作馆藏是图书馆联盟开展信息资源共享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法明顿计划打破了单个图书馆馆藏资源的发展模式，创建了一种由多个不同类型图书馆共建共享信息资源的方式，这一事物被称为合作馆藏，并由此成为早期单个图书馆聚合需求形成图书馆联盟的重要基础。

法明顿计划的第三个后续影响就是其为实现使用价值而进行的各种业务和活动。为了实现法明顿计划的使用价值，该计划的主导者确定了合作馆藏建设的原则、合作馆藏建设的方式（专题资料合作入藏、学科资料合作入藏、地区分工合作入藏）、合作馆藏组织的技术和方法等内容，为合作馆藏的实现途径提供了主要内容，如法明顿计划建立的合作馆藏功能体系包括支持馆际互借、编制联合目录、馆际复印服务、文献配送服务、文献采购信息通报、文献合作采购、按主题分工收集等内容[26]。

但是，20世纪70年代左右，法明顿计划的主导者发现这种分散的收藏策略在降低资源建设成本方面并未显示出明显的优越性，反而给联邦政府和各个成员馆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和业务压力，一些资助者也由此质疑法明顿计划的价值。之后，伴随联邦政府对图书馆财政经费的大幅缩减，法明顿计划也以1981年东京中心的关闭而宣告结束。但合作馆藏的实践并未因此中断，反而在经费缩减的背景下迎来了新的发展——以美国国会图书馆为主导的合作馆藏让位于以联机图书馆中心、美国大西部图书馆联盟等代表的地区性和自发性合作馆藏实践。

张康，李卓卓，苗森儿. 从合作馆藏到集体馆藏的探索：法明顿计划 80 年后的审思[J]. 图书情报工作,2021,65(20):31 - 41.

4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合作馆藏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随着美国进入经济衰退时期和政治上的保守时期，国家对图书馆支持有所下降，部分合作馆藏项目也由于经费短缺而停止，法明顿计划被迫中断。但合作馆藏并未中断，图书馆在经历了价值反思、使命重构、功能设计、服务重塑、从拥有转向存取等一系列调整之后，由协调式转向互补式，在信息资源共享的建设目标、本身内涵特征、实现途径等方面进行了再定义，并在大量新的图书馆联盟的组织保障下再次兴起。在这个过程中，合作馆藏的发展呈现两大显著的变化：一是对合作馆藏高度利他性的反思；二是对协调式合作馆藏的反思。

4.1 对高度利他性的反思

第一种反思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法明顿计划破产后，部分合作馆藏的参与者发现，合作馆藏所强调的高度利他性可能并不具备经济效益，产生的结果具有不可预测性[27]，该计划的破产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对于参加合作馆藏计划的成员馆来说，他们最大的期望就是通过参与集体计划，帮助自身获得更多受益，如摆脱经费有限、丰富图书馆可用馆藏资源等。因此，成员在进行资源收集时往往倾向于优先购置本馆用户需要的馆藏，以充实本馆馆藏资源为主，其次才是发展非本图书馆核心馆藏、非常用馆藏（对组织内其他成员有明显使用价值的馆藏资源）。但是法明顿计划孕育的合作馆藏中，成员馆利己的特性往往被共同的使用价值目标淡化，反而突出成员馆共同合作建立一个“大而全”的馆藏结构，以满足整体需求，是在“拥有”这一理念下发展起来的信息资源建设实践。由于忽视了合作成员加入项目计划的最初动机，该计划对于调动参与成员的积极性，促进项目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天然的缺陷。与此相对，迪尤克大学图书馆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图书馆在确立合作馆藏计划时，唐斯和布兰斯科姆两位馆长一致认为，不应该要求成员馆放弃任何利益，反而应当明确参与计划得到的好处。这一原则的确立为迪尤克大学和北卡罗莱纳大学合作馆藏的长久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1961 年，迪尤克大学图书馆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图书馆重新评议了它们间的合作协议，并重点权衡了参加当地合作采访计划与全国合作采访计划（如法明顿计划）的利弊。1963 年，迪尤克大学图书馆员鲍威尔写信给北卡罗来纳大学图书馆员奥恩，商讨两馆是否应放弃拉丁美洲研究资料的合作藏书协议转而支持全国合作藏书计划（法明顿计划）。奥恩在回信中表示，参加全国合作藏书计划必须符合各馆的自身利益。经过讨论，两馆认为法明顿计划所强调的高度利他性与合作馆藏本身的高度利己性相矛盾，该计划与自身已经确立的原则相悖[28]。因此，两个图书馆最终决定不参加法明顿计划，选择继续支持拉丁美洲合作馆藏计划。

4.2 对协调式合作馆藏的反思

第二种反思始于 20 世纪 90 年年代。随着多学科研究重要性的日益增长，计算机、数据库、多媒体及通信技术等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尤其是数字图书馆的出现和推广，以地区性和自发性为主要特征的新一代图书馆协作网的形成，合作馆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协调式合作馆藏让位于互补式合作馆藏。就法明顿计划孕育的合作馆藏本身属性来看，合作馆藏多是以馆际互借和联合目录等协作内容为主要纽带相互连接起来的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实践[29]，各个图书馆可以通过联合目录明确馆藏资源的基本情况，确定入藏馆藏资源的范围，并通过馆际互借和复制方式提供给读者使用。在高度利他性的导向下，入藏文献追求的是大而全，尽可能完整地收集所有的研究资料，成员馆的分工是出于对整个研究群体对于学科资料、主题资料、区域语言等综合需求的考量而确定的，更多强调的是服务方面的互惠，而在资源上缺少深入而细致的协同。因而，这样的合作被称为馆藏资源服务的协调，意味着拥有什么资源，就共享什么。

然而，伴随图书馆经费的削减、人类研究资料的几何式增长、单位资源获取费用的增加，图书馆从强调“拥有”转向突出“存取”，图书馆不得不思考一种更为有效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方式——互补式合作馆藏。互补式合作馆藏以尊重成员利益为基本原则，围绕本馆核心需求建立差异化馆藏，试图将有限的经费用于购买优势学科和重点学科的研究资料，开展多学科合作馆藏。例如，在著名的三角图书馆合作馆藏计划中，北卡罗来纳大学查贝尔希尔分校图书馆购买了保障其语言学研究的专业书籍和字典，以及一些高价书刊、缩微出版物、报纸和过刊；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图书馆购买了美国专利的缩微品；迪尤克大学图书馆购买了外国地区研究资料。之后，由于科技及医学期刊数量剧增，价格大幅度上涨。为了应付其资金不足以及扩大

其合作范围,迪尤克大学、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与北卡罗来大学查贝尔希尔分校三馆于 1990 年达成了非印刷资料、政府文献、医学与科技领域的合作藏书协议,与此类似的还有 AAU/ARL 全球资源计划[30]。这些实践成功地证明了即使在经费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图书馆也可以通过合作来满足用户的需求,为合作馆藏的进一步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5 从合作馆藏到集体馆藏:数据驱动下共享价值的显性化

集体馆藏的概念已广为人知,被认为代表着图书馆馆藏管理的未来——标志着图书馆正在向着合作和协作不断发展,为个体图书馆通过集体作为和功能共享而寻求最大化价值创造了契机,以多种方式在实践中得到采用,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5.1 集体馆藏的抱负

在 21 世纪网络环境中,一方面,图书馆馆藏普遍面临着超载状态,临界范围成为图书馆在进行信息资源建设时不得不面临的问题[31]。换言之,纸质资源累积不断增加了图书馆空间上的压力,图书馆试图通过从拥有过渡到存取为主,释放馆藏的空间和价值,使得图书馆不得不向"机构之上"转变,成为越来越根植于网络环境中的组织;另一方面,馆藏不再是用户信息生活的核心,他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资源丰富的网络中。图书馆目标不再是建立一个大型的本地馆藏,而是促进用户获取研究和学习所需的资源。因而,图书馆往往需要在纸质资源和数字资源中做出选择,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内容的重复,最大程度彰显经费的使用价值和服务效益,任何一个图书馆都可能会根据本馆的需要依托一个或数个图书馆联盟的庞大资源体系。这两种转变对信息资源共享提出了新的要求——建立了一个凸显合作效益的大规模信息资源共享总体图景,并通过一种更加强有力的信息资源共享网络和更密切的资源协同体系将其与用户感兴趣的领域联系起来[32]。

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界提出了集体馆藏的概念。2014 年 7 月,OCLC 研究部被授予美国图书馆馆藏及技术服务协会(ALCTS)"社长奖(Presidential Cotation)",获奖的理由是表彰其在集体馆藏方面的贡献。2016 年 6 月,OCLC 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 *Strength in Numbers: The Research Libraries UK*,在报告中,研究人员对当前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环境进行了描述[32]:①图书馆的各项服务和活动都超越了本地馆藏的限制;②在广阔的网络环境中,存在着获取和发布聚合图书馆资源(集体馆藏是一个聚合型资源)的需求;③在大系统的基础上,图书馆资源的供需存在优化的机会。报告将集体馆藏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机构的合并馆藏资源"。该定义将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概念提升到比单个图书馆更高的层次,将其边界扩大到包括集中在图书馆系统中的所有馆藏资源(这些馆藏资源被视为特定的集体资产)。集体馆藏不是几个图书馆馆藏的简单总和,而是馆藏被合并后,将重复的馆藏移除,以产生整个图书馆系统所持有不同馆藏资源的集合,进而凸显每个图书馆馆藏资源的特色价值[18]。集体馆藏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资源建设机制,象征着图书馆管理策略的新转变:从提供本地图书馆馆藏和服务转向更加依赖合作机制、集体馆藏、共享技术平台,向"机构之上"的管理。

5.2 意义重构下的集体馆藏

从上述集体馆藏产生的背景及其内涵来看,集体馆藏似乎一开始就被期待具有三种价值:①作为馆藏状况的一个分析工具,帮助了解集体收藏的范围和深度,为识别成员个体优势和群体冗余提供数据基础;②通过系统合作意识帮助个体图书馆决策,利用集体馆藏数据,帮助个体图书馆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制定更为科学的馆藏发展策略(收购、保留和取消访问);③针对特殊馆藏资源的分散性(如特色馆藏),帮助图书馆进行系统的馆藏资源聚合,扩大单个图书馆的资源范围,以产生临界数量的馆藏资源,使图书馆能在既定责任范围内做出更专业和广泛的贡献。

上述对集体馆藏产生的背景及其意义的分析显示:①集体馆藏建立了信息资源共享的全系统视角,与合作馆藏所提倡的高度利他性和利己性不同,它强调图书馆和为其提供服务的机构应更加关注全系统的信息资源建设(这个系统既可以是区域的,也可以是国家的,甚至是全球性的),即集体馆藏不是简单的信息资源聚合,而是要为知识跟踪、学习、评价、利用和创造等活动提供深度的全方位支持。②与合作馆藏以预入藏馆藏的合作采购为对象不同,集体馆藏所指的馆藏资源是图书馆系统拥有可供使用的全部馆藏资源,它可以是图书、期刊,也可以是数据以及其他特殊材料。例如,十大学术图书馆联盟(BTAA)和英国研究图书馆联

盟(UKRL)的集体馆藏由大量印刷型文献构成,纽约艺术图书馆联盟的集体馆藏主要由弗里克艺术博物馆图书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托马斯沃森图书馆、布鲁克林博物馆和现代艺术博物馆图书馆的展览记录薄、图谱等特殊资料构成。③集体馆藏具有识别、分散信息资源储备风险的作用。集体馆藏是以数据为基础的,依据多源完备的数据,可以精准识别某一资源在全系统中的稀缺程度,依据稀缺程度制定馆藏资源的分级保存制度,如英国 UKRL 采取分布式集体馆藏建设模式,要求成员馆低利用印刷纸质文献至少有两个复本被长期保存和永久存取。④集体馆藏具有凸显合作效益的特点。与合作馆藏追求馆藏资源覆盖范围不同,集体馆藏通过围绕用户需求有效整合资源,凸显的是馆藏资源对用户需求的支持程度。同时,由于集体馆藏具有数据驱动的特征,其合作效益是可视的、显性的。⑤集体馆藏强调信息资源保障和共享的多元中心制。与合作馆藏相比,集体馆藏更加强调图书馆核心资源和特色资源的补缺和补差,因而由于各个图书馆在馆藏资源结构上具有相对稀缺性的特征,联盟内部围绕不同资源形成了不同的资源保障中心和共享中心。

5.3 集体馆藏的项目实践

集体馆藏自 2013 年被提出后就备受关注,目前已经发展为 OCLC 实施全球图书馆共建共享战略的理论基础,并以项目实践的形式证明了在数据赋能下,其在合作效益显性化方面的独特价值。

5.3.1 十大学术图书馆联盟的集体馆藏:数据驱动的系统最优意识

十大学术图书馆联盟的集体馆藏的建立是立足于数据驱动,以形成全系统意识和整体效益为目标导向的,是回溯性和发展性并重的集体馆藏协调模式[33]。数据是 BATT 集体馆藏的关键和基础,一方面,数据决定了 BATT 成员馆如何参与到集体馆藏项目的构建之中;另一方面,数据作为动态的价值分析工具,能够从量化和可视化的角度凸显成员馆参加项目后给自身带来的价值以及对整个系统的贡献。简单地说,BATT 集体馆藏的数据驱动的系统最优意识的实现是以数据管理为基础的,数据能够为成员参加集体行动提供证据,也能帮助成员馆在全系统意识下作出整体效益最优的决策。BATT 集体馆藏的数据管理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34]:①系统整合馆藏资源元数据。通过建立统一的通用元数据标准,统一 BATT 项目成员馆所有馆藏数据,如数目数据,并将其汇交于 WorldShare IL 平台的 ReCAP 共享集合中。②汇交业务数据。使用统一的数据标识符(如 ISBN 和 DOI)对 BATT 集体馆藏的互借数据、流通和电子资源下载使用情况数据进行维护统计,为项目发展提供动态化证据。③聚合成员馆馆藏发展政策数据,并对这些政策数据进行汇总和研究,为科学协调各个成员的馆藏发展政策,为达成集体行动的一致性提供决策依据。以这些数据为基础,BATT 形成了数据驱动的全系统整体信息资源建设意识,并为集体行动的监控、效益评估和优化提供情报支持,辅助成员馆在资源共享(扩展可用馆藏)、数字化策略的选择(扩大对可用馆藏的访问)、复制共享(整合馆藏,获取和保存学术和文化记忆)等选择上追求整体最优。

5.3.2 英国研究图书馆联盟集体馆藏:共享价值的显性化

通过汇总各成员的数据,UKRL 项目绘制了 32 个成员馆共同的集体馆藏发展蓝图,从馆藏资源的重叠性和相对稀缺性两个方面凸显集体馆藏的共享价值[35]。首先,UKRL 全面系统地考察了馆藏资源内部重叠和外部重叠。所谓内部重叠是指集体馆藏内部知识的重复性,UKRL 以单本作品的重复率为统计单元,主要包括单本图书的复本量和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UKRL 项目通过与 Worldcat 数据库的书目记录进行比对,建立了 458 000 个不同的主题术语分面应用主题(Faceted Application of Subject Terminology, FAST)[36],用于内部重叠性去重,旨在发现全系统内部成员馆藏的潜在冗余和成员馆的共享优势;所谓外部重叠性是指 UKRL 集体馆藏的馆藏资源与其他资源集相比的相似程度,旨在衡量全系统馆藏资源的发展潜力,帮助项目指定长远发展战略,如与 Hathitrust 的数字文献资源集进行比对,可以为馆藏资源的数字化保存战略提供决策情报。其次,在对馆藏资源重叠性精准识别的基础上,UKRL 进一步明确馆藏资源相对稀缺性和独特性是决定成员馆应采取何种合作方式,进行何种主题的合作的重要参考依据,进而为衡量个体成员馆对集体馆藏的独特贡献提供依据,这要归功于 FAST 主题的成功应用——FAST 的主题分析能够帮助识别个体成员在哪些主题上具有合作兴趣和发展潜力(相对稀缺资源的互补)。

6 合作馆藏和集体馆藏对我国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的启示

合作馆藏作为信息资源共享的创举,曾为图书馆在经费缩减、馆藏超载、馆藏结构和资源配置有待优化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经验和方向,但在新的信息环境中,集体馆藏通过信息资源共享的再次深化,在大共享的约定下,构筑起更为坚固的基于资源深度合作的"朋友圈",为我国信息资源共享提供了以下启示。

6.1 强化图书馆信息资源保障的战略支撑价值

图书馆信息资源的战略支撑价值是当前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的重要目标导向和发展方向。对于个体图书馆而言,当前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在保障上侧重拥有[37],在共享上侧重效益,更加突出图书馆信息资源对外部战略支撑作用的显性化,要求其改变过往有什么就提供什么服务的资源主导模式[38],根据战略服务需求寻求与其他图书馆合作,定制合作方案。对于图书馆联盟而言,图书馆联盟的发展目标也不仅是关注自身战略目标的实现,而是试图将自身的战略目标融入到国家将信息资源作为战略资源的背景下,考虑图书馆信息资源保障对国家整体战略的支撑作用[39],更加重视图书馆信息资源在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中的保障作用,将文献信息资源作为必不可少的战略性创新资源要素。相较于合作馆藏而言,集体馆藏在这一方面更具优势,能够帮助我国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考虑国家创新总体战略下在全球文献信息资源配置中评估我国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系统可靠、稳定和优质的问题;对于成员馆来说,集体馆藏可以帮助成员馆评估它们在资源和成本投入方面的可见收益;对于系统而言,集体馆藏侧重对保障系统的绩效评估,关注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系统服务效益,能够帮助图书馆联盟和成员图书馆从服务需求的战略高度考察"可以有什么信息资源""需要什么信息资源""还需要什么信息资源""能否一直拥有这些信息资源"等问题,而不仅仅是"有什么"和"有多少"的问题。

当前,在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导向下,信息资源作为战略性资源,从大系统意识角度对信息资源共享的科技创新战略支持价值提出了新的要求:信息资源共享需要从更高的层次审视信息资源保障的安全问题和效率问题[40],重点考察复杂环境中的信息资源保障系统面临的不确定性(如外文信息资源的封锁与垄断、战争和自然灾害下印刷文献的损毁等),从而在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导向下,利用数据开展信息资源保障的安全、效率和支撑作用的评估和预测工作[41],打破现有图书馆联盟固有的条块障碍,转而支持以细粒度的精准资源服务为驱动的跨系统图书馆深度合作,从而辅助图书馆在信息资源建设的实践中围绕战略支撑追求整体最优的集体行动。

6.2 追求越精准越协同的共赢理念

精准化协同发展是提高图书馆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整体效能和推动图书馆深度合作的重要途径。在合作馆藏时期,大多图书馆联盟以"大而全"的规模化馆藏建设为追求,力求尽可能多地囊括各类型的成员图书馆。成员图书馆合作的动力主要是获得自身不具备的文献资源、服务,联盟通过集体采购、书目参照比对和馆际互借等方式来协调成员的集体行动。对于成员馆来说,加入联盟更倾向于"形式上的合作",多数情况下仅在发生了馆际互借等需求时产生共享的联系,而在信息资源共建端缺乏实质性联系,因而并未形成实质性的共建共享活动[22]。例如,从机编目数据上看我国高校图书馆联盟,截至 2018 年,CALIS 成员馆有 1 700余个,但实际参与的图书馆仅 695 个,占比约为 40%,其核心活跃成员图书馆仅有 136 个,占比仅为 8%[42]。对于整个联盟来说,成员图书馆数量的增加虽然丰富了馆藏的数量和种类,但这种资源往往具有较高的重叠性,相对稀缺性和特色资源相对不足,如根据 CALIS 联机 2015–2018 年的编目数据显示,我国高校图书馆独占性馆藏资源册数占比约为 0.42%,约占总种类数的 11.22%,特有馆藏资源册数占比 5.74%,约占总种类数的 32.42%[25]。这种馆藏资源的高度同质性和庞大规模的现状增加了开展深度协调成员馆的成本和难度,影响了整个系统的灵活性和针对性。

然而在集体馆藏下,信息资源共享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哪些资源和服务是服务战略需要的,这些资源和服务能够为战略提供什么支撑、如何支撑等问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图书馆在合作对象、合作方式和内容等方面的选择上更为精准,即联盟可以根据成员图书馆的优势馆藏资源和可视化的馆藏收益预期,帮助成员馆以合作效能和战略支撑为追求探寻合作的最佳路径,由形式上的合作向深度协作转变,实现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和共享双向合作。例如,在越精准越协同理念的指导下,BATT 项目基于 Worldcat 对集体馆

藏进行分析，将不同来源和不同结构的数据进行整理，形成了用于揭示集体馆藏结构、分析成员合作效益、预测集体馆藏未来状况和合作前景、动态监管集体馆藏变化的仪表板，为成员之间的精准合作提供数据基础和情报支持。

6.3 凸显数据赋能的效用导向

信息资源共享从合作馆藏走向集体馆藏，条块分割的信息资源共享系统间的数据不断走向融合，统一的数据基础为如何开展精准合作，建立信息资源的动态互补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对于我国图书馆联盟而言，整合条块分割的异质数据和构建高质量的底层数据基础是建立动态互补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主要障碍[43]，特别是我国现有外文资源的保障体系，分布在国家图书馆、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和部分公共图书馆中，但是这些外文资料在支持科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虽然实现跨系统的全方位合作难度很大，但却可以在特定类型和学科间实现基于数据聚合的资源整合，这可以有效避免图书馆间的合作流于形式缺乏实质推进。例如，可以基于《全国总书目》和《全国新书目》的基础，建立具有合作服务性质的信息资源数据共享平台。可以借鉴集体馆藏理念，将所有成员馆藏作为一个特定的整体资源进行管理，用量化的数据描绘馆藏的边界和规模，通过精准的数据刻画、数据整合和挖掘，为成员馆提供"和谁合作""怎么合作"等决策数据支持。

数据基础越全面详实，集体馆藏的合作效益的显性化越明显，成员合作选择越多元，集体馆藏内容形式就越丰富，对于战略的支撑作用和深度精准合作的价值越明显。例如，美国/加拿大集体馆藏项目利用Worldcat数据，对美国和加拿大印刷文献进行了精准的量化分析，依据馆藏种数和数量划分为12个大区，制定了区域集体馆藏协作计划，成员馆既可以在美国/加拿大集体馆藏的层面进行合作，也可以根据需求进行小范围的合作，甚至可以就某一学科主题资源的互补需求进行合作[44]。同时，由于数据仅为成员协作提供决策情报并不具备强制性，因而更容易打破图书馆联盟组织架构约束，形成以多个图书馆为中心的多中心馆藏圈，实现由数据整合到服务集成的跨越。例如，BATT集体馆藏项目成员中，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是Minitex项目中的主要成员，俄亥俄大学图书馆是Ohio-Link项目的核心成员。

7 结语

以1942年法明顿计划为起点，合作馆藏已经走过了近80年的历史。在发展过程中，环境的变易、资助者的质疑、图书馆对自身影响力的反思都曾对这一历史创见产生影响：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对合作馆藏高度利他性的反思和90年代转向互补式合作馆藏发展模式的两次反思后，又在意义重构中完成了由合作馆藏到集体馆藏的转变。在这一系列的转变中，战略层面目标价值的导向、功能层面协同策略的定位和动力层面数据价值的挖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今时代，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被赋予了更多新的内涵与要求，需要不断强化图书馆信息资源的战略支撑作用，追求精准化和精细化协同方式，重视数据的驱动价值以创新图书馆信息资源服务方式来提升图书馆服务水平，彰显开放、共享和合作的精神意义和存在价值。

参考文献：

[1] DEMPSEY L, MALPAS C, LAVIOE B. Collection directions: the evolution of library collections and collecting[J]. Portal: libraries and the academy, 2014, 14(3): 393－423.

[2] NANCY E. OCLC research: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Journal of library administration, 2009, 49(7): 5－11.

[3] CLEMENT S, SUSANNE K. From collaborative purchasing towards collaborative discard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shared print repository [J]. Collection management, 2012, 37(3/4): 153－167.

[4] DEMPSEY L. Library collections in the life of the user: two firections[J]. Liber quarterly, 2016, 26(4): 332－338.

[5] VOSPER R. Farmingtion redivivus: the years of co-ordinated foreign book procurement in the U. S. [J]. Library journal, 1959, 11(2): 327－334.

[6] GIBB I P. Foreign book procuremen: the decennial Farmington Plan survey and afterwards[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1960, 16(1): 1－9.

[7] 王劲松，梁丽.中美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政府行为比较研究[J].新世纪图书馆,2009,37(1):26－28.

[8] EDELMAN H H. The death of the Farmington Plan[J]. Library journal, 1973, 17(5): 25－32.

[9] SHELTON C Y. Best practices in cooperative collection development[J]. Collection management, 2008, 28(3): 191－222.

[10] SOHN J. Cooperative collection development[J]. Collection management, 1986, 8(2): 1－10.

[11] 郭晓红.基于分布式合作储存的印本馆藏共享机制研究——以美国缅因州共享印本馆藏项目实践为例[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7(2):49－53.

[12] 郭晓红.图书馆转型下的学术印本资源分布式区域合作储存研究——以美国西部学术资源区域合作储存实践为例[J].情报

资料工作,2017(4):68-74.
[13] DANNELLY G Y. The center for research libraries and cooperative collection development[J]. Collection management,1998,23(4):37-45.
[14] MALLERY M, THEU S. New frontiers in collaborative collection management[J]. Technical services quarterly,2012,29(2):101-112.
[15] BOSCH S, LYONS L. Measuring success of cooperative collection development[J]. Collection management,2004,28(3):223-239.
[16] KIEFT R H, PAYNE L. Collective collection, collective action [J]. Collection management, 2012,37(3):137-152.
[17] DEMAS S, Miller E M. Rethinking collection management plans: hoping collective collect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J]. Collection management, 2012,37:(3):168-187.
[18] GARSKOF J, MORRIS J. Towards the collective collection: lessons learned from PALCI's DDA pilot projects and next steps[J]. Collaborative librarianship, 2016, 8(2): 3-7.
[19] HRLWN N L. Michigan shared print initiative and Green Glass for groups for data analysis in developing a collaborative collective collection[J] Document delivery & electronic reserve, 2014,25(3):89-105.
[20] BAKKER T. Resource sharing in Dutch academic libraries[J]. Resource sharing & information networks,1998,13(2): 15-27.
[21] 王红霞. 学术图书馆联盟集体馆藏建设研究——以十大学术联盟为例[J]. 图书馆学研究,2020(15):71-77.
[22] 许炜,李卓卓. "双一流"背景下数据驱动的高校图书馆集体馆藏与精准合作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2020(21):23-31.
[23] MIRSKY L. From Farmington Plan to the Pacific Rim Digital Library Alliance[J] Collection management,1999,24(13):241-250.
[24] 周晓英,崔佳佳,唐宇萍,等. 情报学的起源与方向——从布什的《诚如所思》谈起[J]. 情报科学,2004(2):129-132.
[25] WOLFGANG M. Cooperative collection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 sharing among art libraries: past and present[J]. Art libraries journal,1986(11): 19-32.
[26] 上海地区文献资源共享协作网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联合课题组. 美国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的历史与现状[J]. 图书馆杂志,1999(10):19-22.
[27] TERENCE K. Collaborative collection development comes of age [J]. Computers in libraries,2015,35(3):25-27.
[28] DEMPSEY D. A history of the Farmington Plan [J]. Libraries & Culture,2004(4):473-475.
[29] KENNETH S. Warren the evolution of selective biomedical libraries and their us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J].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1987,257(19):67-71.
[30] 龙旭梅,王先林. 美国合作藏书建设的发展综述[J]. 中华医学图书馆杂志,2000,36(5):17-21.
[31] 肖希明. 藏书发展模式的选择:拥有还是存取? [J]. 图书馆论坛,2002,22(1):56-59.
[32] DEMPSEY L. The emergence of the collective collection: analyzing aggregate print library holdings[M]. Dublin, OH: OCLC Research,2013:8.
[33] LAVOIE B, DEMPSEY L, MALPAS C. Reflections on collective collections[J].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2020,81(6):112-131.
[34] DEMPSEY L, MALPAS C, SANDLER M. Operationalizing the BIG collective collection: a case study of consolidation vs autonomy [EB/OL]. [2021-01-13]. https://digitalcommons.unl.edu/scholcom/119.
[35] MALPAS C, LAVOIE B. Strength in numbers: the research libraries UK(RLUK) collective collection[EB/OL]. [2020-05-28]. http://www.oclc.org/content/dam/research/publications/2016/oclcresearch-strength-in-numbers-rluk-collective-collection-2016-a4.pdf.
[36] OCLC. FAST(Faceted application of subject terminology)[EB/OL]. [2021-01-13]. https://www.oclc.org/research/areas/data-science/fast.html.
[37] 刘兹恒. 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过去和未来[N]. 新华书目报,2020-12-25(025).
[38] KIEFT B A. College library, its print monograph collection and the new information ecology[J]. Against the grain,2014,22(5):7-10.
[39] 叶继元. 聚焦学科核心领域,重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J]. 图书与情报,2020(5):1-8.
[40] 郭晶. 赋能存量,做优增量,把握变量——面向"十四五"的国内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思考[J]. 图书情报工作,2021,65(1): 47-54.
[41] 曾建勋. 开放融合环境下NSTL资源建设的发展思考[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38(6):63-70.
[42] DING J, YU S, WANG H, et al. Member structure and sharing behavior: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f CALIS online cataloging data in China[J].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2020,46(2):102-115.
[43] 裴成发,温芳芳. 国外图书馆联盟信息资源建设制度研究进展(2005-2014)[J]. 图书情报工作,2015,59(15):122-132.
[44] LAVOIE B. The US and Canadian collective print book collection: A 2019 snapshot[EB/OL]. [2021-04-07]. https://www.oclc.org/research/publications/2019/oclcresearch-us-and-canadian-collective-print-book-collection-2019.html.

作者贡献说明:
张康:论文撰写与修改;
李卓卓:提出研究思路和论文框架,论文修改与最终版本的确定;
苗淼儿:资料收集与论文修改。

Research from Cooperative Collection to Collective Collection: Reflections After 80 Years of Farmington Plan

Zhang Kang　Li Zhuozhuo　Miao Miao'er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xploration process of library information resources sharing t after Farmington Plan, analyzes the deep value significance of cooperative collection and collective collection, and determines the anchor point for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Method/process**] The study reviewed the two "milestones" in the process of library information sharing since the 1940s: cooperative collection and collective collection, revealed the value significance behind them, and analyzed how these value promote cooperative collection to collective collection. [**Result/conclus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Farmington Plan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ooperative collection from three aspects: goal orientation, connotation setting and realization approach; in the 1970s and 1990s, the exploration of cooperative collection experienced the reflection of "highly altruistic" and "synergism cooperative collection", and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pecting members' interests" and "complementary cooperative collec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under the goal guidance of data-driven and highlighting the benefits of cooperation, the cooperative collection turned to the collective collection. These values have enlightening effects on the practic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strengthening the strategic support rol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resources construction, pursuing the win-win concept of more accurate and more collaborative, and highlighting the efficiency orientation of data empowerment.

Keywords: Farmington Plan　cooperative collection　collective collection　information sharing　information development